

在媒介学研究中,我们必须离开麦克卢汉的“后视镜”,转向西蒙东的“生成论”。西蒙东的观点是:要从发生论的原则出发来定义技术物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个别的技术物不是这个或那个东西,不是出现在此时此地的东西,而是生成。技术物的一体性、个体性、特殊性,都是它生成的稳定的以及聚合的特征。技术物并不先于它的生成,而是呈现于这种生成的每一步骤;技术物是生成的一体性。因此,必须将技术物的起源和其他类型的物(审美物,有机物)区别开来;也必须将这些特定的生成/进化方式与在生成后通过考虑各种对象的特征而建立的静态分类方法区分开来。^①

“生成”的视角不是“后视镜”,而是“前照灯”。研究媒介也就是在研究媒介的生成,而不是事过之后的测评和论定。这在媒介史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如果媒介并不是先于它的生成存在,而是在其“媒介化”的生成之中,一种媒介就是媒介性的特殊表现和运作过程。沃尔格就明确提醒,媒介不能被简化为再现手段,不能被简化为技术,不能被简化为机器,也不能被简化为符号系统,这些都不能充分解释媒介的概念。媒介的历史和理论必须面向媒介,也就是媒介的功能和运作在诸多异质性元素——如装置、代码、符号系统、知识形式、具体实践和审美体验——的结合中生成独特的场景或情境。千万不可倒转过来,把独特的场景或情境作为一个实据,来证明某一类型的媒介特征及其作用。

麦克卢汉为媒介研究开启了感知的大门,但他的“后视镜”中的“人的延伸”,未能参透媒介之谜,更不能揭示今天数字人的秘密。媒介的生成不能以“对象的特征而建立的静态方法”来处理。我们需要为媒介研究创建更灵活的模型或范式,以探究不同技术和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沉溺于线性预测或者做验证。21世纪的媒介学研究要分清与麦克卢汉的界线。

二象性视野中的媒介问题 ——再思媒介研究的认识论困境

□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60年前,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问世。彼德斯因此将1964年誉为“充满喜悦的1964年”。^②在他看来,正是在麦克卢汉的推动下,媒介研究从无到有。不过,整整60年过去了,麦克卢汉和他的媒介理论一直伴随着争议,如何对待《理解媒介》及其思想遗产,从来就没有达成过共识。

对于笛卡尔的信徒来说,麦克卢汉是一位故弄玄虚的技术决定论者。这不仅体现在《理解媒介》中,更贯穿在麦克卢汉几乎所有著述中,他从未给任何概念以明确和清晰的定义。这极大地挑战了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论述的哲学方法论的第一原则,从而引发实证主义者的强烈不满,被视为异端。在施拉姆看来,麦克卢汉的神秘之处只是在于其表述的不连贯,“他的论述方式使得他的观点难以捉摸……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态度是有些玄妙的”,^③但说到底,“麦克卢汉,正如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一样,是个技术决定论者”。^④

也有观点认为,麦克卢汉的思想似乎还远未得到有效挖掘。哈曼曾说:“我想要说服各位,麦克卢汉对于哲学界来说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只是因为麦克卢汉是媒介理论家,还因为哲学最终可能只不过是媒介理论而已。”^⑤在此基础上,他阐发了新物质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媒介观。然而,哈曼从《理解媒介》中解读出来的思想,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并不是麦克卢汉的本意,而只是哈曼自己的借题发挥。

如果以麦克卢汉的思想为起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都具有合理性。在我看来,《理解媒介》确实没有提供任何明晰的概念,而只有一堆混沌甚至自相矛盾的隐喻,也因此给借题

① 麦尔贝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第12页。

② 约翰·杜海姆·彼德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页。

③④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36—137页,第137页。

⑤ 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9页。



① 汉斯·布鲁门贝格：《隐喻学范式》，李贯峰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第8页。

② 胡翼青、王焕超：《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现代传播》2020年第4期。

③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3页。

④ Marshall McLuhan and Eric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p.5.

⑤⑥⑦ 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第219页，第220页，第220页。

⑧ 马歇尔·麦克卢汉：《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183—184页。

发挥创造了空间。但这不是麦克卢汉的故弄玄虚或言之未尽，而是认识论危机的表征。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电视进入千家万户，如何理解新媒介之于人类的意义成为认识论的难题。麦克卢汉极其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他只能借助一系列关于媒介的隐喻，而不是更加明晰的学术概念来形容人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在世存有。此时的媒介环境就是布鲁门贝格所说的无法用明晰概念所表达的“绝对隐喻”。^①所以，《理解媒介》并不真正理解媒介，只是借助隐喻来表达概念无法表达的洞见。“媒介即讯息”“媒介即环境”“媒介即延伸”“媒介即过程”等一系列媒介隐喻恰恰说明麦克卢汉并没有找到克服当时认识论困境的理论路径。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绝非技术决定论可以概括，其隐喻意涵值得反复审视。但这种贡献也不能被夸大。麦克卢汉的人本主义立场，他所处时代的媒介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知识结构，并不能超越其时代局限性。所以，给麦克卢汉贴上技术决定论标签和对其学说进行过度阐释都不是我们与之发生关系的最佳方式。笔者至今依然认为麦克卢汉对当下媒介理论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强调应以媒介技术或媒介形式而非内容作为研究对象；二是媒介并非仅仅是一种实体，它更是一种隐喻；三是媒介是社会的组织者。^②但这些贡献主要指向“发现媒介”而非“理解媒介”，且这种“发现”主要体现在揭示以往没有发现的媒介尺度。

以媒介形式而非媒介内容为研究对象，意味着要去发现“媒介”。否则，媒介是“躲”在内容后面的，没有这一发现便没有将媒介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理论体系。即便非常反对麦克卢汉的人本主义立场，基特勒依然高度认同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本身的关注：“重要的已不是信息，也不是在技术时代为所谓灵魂配备的信息或内容，而是（严格按照麦克卢汉的话说）它们的电路，是感知的图示。”^③更进一步的是，麦克卢汉借鉴格式塔心理学的概念，将

所有情境划分为一个“受关注之处”（外观，figure）和另一个更大的“不受关注之处”（背景，ground），“外观与背景通过共同的边界或间隙产生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进而同时定义二者”。^④在这种二元关系中，背景起到奠基性的作用，它产生于外观之前并塑造外观，但外观总是因其可见性而更为瞩目，从而遮蔽了背景本身。所以，哈曼认为“媒介即讯息”阐明了“任何媒介明确表达的内容都不如媒介的在场本身重要”，^⑤因而“媒介隐没于背景之后，默默地主导着我们的意识”。^⑥沿着媒介形式论深入探究，不难发现，麦克卢汉似乎更强调作为背景的媒介和媒介所扮演的背景角色。“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和马丁·海德格尔显然是同盟，他轻蔑地看待在手性的外观和存在之诗，这些都处于意识可接触之外。”^⑦可见，麦克卢汉强调背景的媒介观与之前和之后那些强调外观和中介性的媒介观并不一样。

强调媒介是一种隐喻而非实体，体现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本体论。在他之前，媒介都是以“可见物”的方式被理解的。因此，人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媒介是什么”而非“什么是媒介”。长期以来媒介的外延比媒介的内涵更受关注，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当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尤其是像电那样的媒介其实是一种无形无相之物时，他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即媒介就是媒介，媒介并不是媒介物。这种观点与只关注媒介物的实体性媒介观并不一样，也避免了英尼斯在媒介与媒介物之间犹豫不决的困境。

强调媒介是“活生生的动力漩涡”集中体现了麦克卢汉对媒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论。“由于电气问题和程序、数学和物理远离了视觉组织和统计学，进而走向动力学、时间组织和心理学家所谓的‘听觉空间’”，导致“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我们能用的手段不再是机械的，而是电子的”。^⑧这说明麦克卢汉的确想通过结合生态学和存在论的方式，来探索电子时代离散与整合、

混乱与秩序互动环流的现实。尽管麦克卢汉曾经提点波兹曼,媒介本身构成教育环境,但与媒介环境学后来的主体设想完全不同的是,麦克卢汉并不赞同把媒介理解为静止的环境,而是把媒介理解为一种不断生成的社会过程。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他关于“媒介四定律”的论述中:媒介提升(enhance)或增强了什么?新媒体使哪些事物过时(obsolesce)?又再现(recur)了哪些先前的行动和服务?当新媒体被推向极致时,将逆转(reverse)成何事物?^①所以,麦克卢汉并没有像他剑桥的老师那样,把媒介文化和媒介素养作为环境保护问题来看待,而是强调了媒介的动态性,强调了媒介对人与社会不断的默默型构。

总而言之,麦克卢汉发现了一些以往传播研究没有强调的媒介面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之前被人们所关注的媒介面向就不存在,只是麦克卢汉似乎不愿意讨论二者的复杂关系。麦克卢汉的矫枉过正,会将媒介的理解导向一种二元对立:媒介内容与形式,中间性与背景性的对立,实体与悬设的对立以及静力学与动力学的对立。而这种媒介观与不断转化和生成的当下媒介世界是不匹配的。

哈曼察觉到,麦克卢汉虽然将媒介视为背景,却疏忽了另一种“起到中介作用的媒介”,^②而正是对内容(外观或中间物)的轻视和对背景的过分聚焦,才导致麦克卢汉长久地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淖。实际上,外观和中间性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个外观使两个背景的联系成为可能,否则就不会发生联系”。^③外观非常重要,且与背景相互转换、相互呈现。虽然人常常被可见的外观所蒙蔽而无法触及背景,但人有且只有通过外观,才能抵达背景和媒介环境,我们永远不能够直接把握背景。“内容或者外观实际上是媒介,因为只有内容和外观能够让我们接触并控制我们认识之外的背景。”^④麦克卢汉强调媒介将不同事物容纳其中,却鲜有关注不同事物之间的连接、

交转与调节,所以他很难从媒介作为背景的角度意识到媒介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媒介是人的连接点,人体也是媒介的连接点,展现的是技术与人和世界的关联”。^⑤当然,只将媒介理解为外观和中间性恐怕也不行,因为外观不仅受制于背景,也可能在某些场景下转化为背景。所以,内容与形式是纠缠在一起的,强调其中的任何一面都会影响对媒介运作方式的理解。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媒介与媒介物的二重性上。麦克卢汉一直想用抽象并不可见的媒介来替代可见的媒介物。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抽象的媒介是看不见的,甚至可能并不存在,媒介与时间、空间一样,无形无相,只是一个概念悬设。媒介只能通过媒介物的显现来部分展现自己,而媒介的生成只能被媒介物的偏向所限定。媒介与媒介物的关系极为复杂:一方面,作为媒介的生成性产物,媒介物必定有自己的偏向,通过媒介物生成的媒介性注定不是完整的;另一方面,媒介物不会完全向媒介敞开,媒介的生成只能借助媒介物的某些特质,比如媒介物的界面。如果没有媒介物的实体化显现,我们无法接触媒介,进而也无法进入媒介生成的那个世界并与之发生关系。但只要通过媒介物的中介,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不受制于媒介物形态的局限。就这样,媒介与媒介物紧紧纠缠在一起,意义悬设与物质实体紧紧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割。

媒介的静与动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二重性问题。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进化、数据基础设施呈现出的强大算力,使媒介世界和现实世界都处于高速运动的状态,这便强求传播学必须抛弃简化、线性、静止、决定论的媒介观。庞大的媒介技术体系中活跃着诸多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其行动共同型构了不断变化、难以预测的生成性媒介环境。强调媒介文化环保主义的媒介环境学被当代学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而加以批判:“利用媒体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

① Marshall McLuhan and Eric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p.5.

②③④ 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第220页,第221页,第223页。

⑤ 黄旦:《延伸:麦克卢汉的“身体”——重新理解媒介》,《新闻记者》2022年第2期。



① 马修·福勒：
《媒介生态学：
艺术与技术文化
中的物质能量》，
麦颠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2019
年，第7页。

② 威廉·弗卢塞尔：
《技术图像的
宇宙》，李一
君译，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21年，第10页。

③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3.

观。”^①所以，在互联网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的今天，运动、无序和不断生成已成为媒介观的主流。不过，动与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转化、相互纠缠的关系。尽管媒介的世界是不断生成的，但人不能用这种方式把握这个世界。正如弗卢塞尔所言：“人们不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空洞而抽象的宇宙中，保有这样破碎而抽象的意识。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努力使宇宙与意识具象化，必须将这些粒子组织起来，使它们实体化（变成可抓取、可想象、可触摸的）。”^②

事实上，媒介始终处于二象性之中。媒介既是外观（内容），又是背景（形式）；既具有居间作用，又具有背景作用；既可以被视为实体，也可以被视为悬设；既可以被把握成不确定性的运动与生成，也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瞬间抓取的秩序，一种无序的有序。由是可以得出结论，麦克卢汉既解蔽了媒介的许多面向，也因此遮蔽了媒介的许多面向。他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媒介的新视角，但似乎又没有系统地去夯实这些关于媒介的复杂认知。所以，我们既要重视麦克卢汉的视角，又没有必要将其媒介理论的具体结论奉为圭臬。

如果顺着麦克卢汉打开的视角以及对其思想的症候式阅读，不难发现，理解媒介的难点不在于什么是媒介或什么是媒介性，而是媒介或媒介性既是什么，又是什么。这就非常类似于物理学上讨论的光的属性：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它既是质料，又是能量。这不再是一种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二元共生。当然，不论采用什么方法，研究者只能观察到光的某一面向，所以虽然光具有双重属性，但对于研究者而言，他用某种方法能捕捉到和呈现出的只能是光的某一种属性。这就是波粒二象性。

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的物理观，同时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哲学观。作为整体关联本体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科学主张，量子力学呈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实在”观，它与我们所认为

的“日常实在”完全脱节，导致我们无法以任何直接或具体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是波还是粒子取决于观测者观察量子物质的方式。与牛顿世界观相反，量子理论中不存在基本且持久的实体，而且作为量子场的基本构成，其能量场或“物质”也没有固定属性。量子物质说明观测者与物质之间相互建构，指向人与物之间的“内-行动”（intra-action）关系。就如巴拉德所说的那样，“与通常所说的‘互动’相反，‘互动’假定有独立的实体先于其互动，而‘内-行动’的概念认识到不同行动者并不先于其内部的行动，而是由其内行动而产生”。^③这样一来，“不同”行动者仅在关系意义上而非绝对意义上有所不同，人与物由此获得了本体论上的同等地位，而它们在相互关系中实现各自作为实体的能动性。巴拉德用量子物理学中的“纠缠”概念作为隐喻来表示能动者（agency）之间的状态。她认为个体并不预先存在，而是通过它们相互纠缠的内在联系而涌现出来。

根据上述二象性的视角，媒介既是一种可以被显化的实体，也是一种在行动过程中涌现出无数可能性的关系或“纠缠”。它在生成媒介物的同时，也生成了各种相互纠缠的甚至无法预期的关系。我们所理解的媒介，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媒介化，它们是用取景框固定下来的实体和关系，当人们将其固定下来时，媒介物显化而媒介消逝。所以，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媒介是生成性的，既不是先在的，也不是静止的；而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观察视角和应用场景框定了媒介物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算力的持续提升，媒介的二象性问题不断涌现，二重性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元”（复数媒介）和“一元”（单数媒介）的二重性越发明显，媒介既可以是多种媒介物，也可以是为数字基础设施配备的一个软件包。从没有哪个时代的媒介如此多元，也从没有哪个时代的媒介像当下这样一元。无论是什么媒介内容

和形式，都只是不同二进制数字流的转化；而同一性和枯燥的数字流，又能转化为完全不同的媒介景观。媒介物在一与多的转化和纠缠中不断生成。

更为复杂的二象性纠缠发生在人与媒介技术体系之间。当今的媒介实践既可以被理解为人通过强大自动化媒介的实践，也可以理解为强大非人行动者对人主体性的限定。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取决于人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而今天的数字化媒介基础设施则通过试错学习不断优化。这两种观察角度迥然不同的认识论互为因果地相互缠绕、不可分割。人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后果有可能成为机器试错学习的由来，而机器自进化的后果又不时地改变人类看待和理解数字化媒介的方式。人工智能留给人类的最重要难题，就是如何理解和说清楚人工智能以何种方式自动运转和自我进化。

至此我们突然意识到，从麦克卢汉那时开始的关于媒介认识论的困境至今依然延续，我们不仅像麦克卢汉一样面对新媒介环境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情况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围绕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媒介而发生的量子纠缠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多元和显性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传播学界能够比以往更加清晰地体会到媒介技术作为非人行动者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接收方式，媒介研究在传播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显现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但我们依然处于认识论的困境之中。平台、数字基础设施、界面、信息茧房……这些统统都是由业学两界共同创造出来，缺乏明晰意涵的隐喻性概念，体现了学界对这些问题的不确定态度。我们似乎注定要沿着1964年麦克卢汉打开的理解媒介之门（也许媒介是永远不能被“理解”的）继续前行，发现并理解当下媒介的“绝对隐喻”，而这种前行也许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是被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强行要求的结果。

附身汉字的“字母幽灵”

——重思麦克卢汉的媒介文明史观

□ 孙黎，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以汉字文明为指代的中国文明，在麦克卢汉的媒介文明史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了作为来自“他者”的刺激，汉字文明在麦克卢汉文明模式的具体分析中还扮演着关键的差异性映照角色，甚至呼应着麦克卢汉对西方文明当代危机的诊断，意味着可能的出路。正因如此，从其汉字文明阐述出发省思其媒介观、媒介文明史观，也是数字时代媒介理论重建的一个重要路径。这一路径至少展示出麦克卢汉以技术与感知比率关系打开文明史新视域的同时，也伴随着在文明空间差异性及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某些遮蔽。就汉字文明而言，最突出的是其被“字母幽灵”笼罩而成为字母文明的“倒置镜像”。麦克卢汉以字母文字为中心的单向技术决定论，是对东西方媒介文明演化的双重简化。面对数字沟通下新的历史“断裂”，麦克卢汉的媒介文明史观已不适合从技术与人复杂互构、彼此生成的角度，在图像、文字、声音与数字多模态媒介生态下把握变动中的新交往关系。

中国文明观内蕴的媒介观

将文字视为文明史演化的主导性媒介，甚至是构成文明演化“基因”般的媒介，是麦克卢汉媒介文明史观的根本出发点，从汉字出发探究中国文明，正是基于这一点。考古学家或人类学家对古人类文明的探查，多将城市、文字与国家的出现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而麦克卢汉的理据则是基于电子媒介的时代冲击。“从文字开讲的理由是‘后书面文化’的性质；从技术的意义上说，‘后书面文